

## 似水流年

## 我的读书人生

我今年77岁了,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。

我的老家在天津郊区农村,我的读书人生开始于小学时代。在上世纪50年代,一个农村小学哪有图书馆,还好,老师们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书架,但上面的书只供老师们借阅。幸运的是,班主任老师特待见我这个学习拔尖儿的学生,特许我借他们的书看。有了这个便利条件,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,《铜墙铁壁》《保卫延安》《风云初记》《黎明河边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……书里有那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,有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知识。我越读越上瘾,从那以后就再也离不开书了。

上中学时,学校有了图书馆,平时忙于学业,寒暑假是我读书最多的时候。因为我仍是老师偏爱的学生,别的同学一次只能借一两本书,我一次可

以借一书包书带回家看。我家离学校3公里,假期中间的返校日,我就换一书包书回来。这期间,我读了大量的红色经典和外国文学名著。

高一辍学后,为了解决借书难的问题,我先是让一位低年级的学妹帮我借书;后来,在天津市北郊区图书馆的支持下,我办起了农村青年图书室,既满足了自己的读书需求,又方便了别人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我在驻山西某部的电影队当放映员,机关图书室就归我们文化处管,图书员是我的好兄弟,我不仅有书可读,还读了《西行漫记》《金陵春梦》《回忆与思考》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等很多内部发行的书。这期间,让我永远难忘、终身受益的是,借着给团以上干部读书班看音响设备的机会,我认真学习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等政治理论书籍。

1976年我转业到地方,当年10月被借调到石家庄市文化局工作。当时,有一项机关干部每周下基层劳动一天的制度,别人都选择去电影院,只有我选择去图书馆。在图书馆的库房里,我看到“文革”中抄家抄来的书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每逢机关干部劳动日,我都会去图书馆,在这座“书山”上找自己喜欢的书。

改革开放后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我由借书看逐步变为买书看。我这辈子烟酒不沾,吃穿不讲究,有点闲钱就买书,日积月累竟攒下了七八千册书。

从1998年11月开始,我每读一本书都要写一篇读后感,到现在已写了1221篇。读书不仅使我生活充实、精神富有,也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。我从一名初中生长成为一名高级政工师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,还被石家庄市社科联聘为重点

课题研究员。我曾经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影评、书评、论文及文学作品100多篇、30多万字,28次在全国、华北区和省、市理论研讨会、优秀社科成果评奖及征文活动中获奖。

我读书是因为喜欢,从没有功利目的,没想到却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鼓励,先后被评为“首届石家庄读书月十大藏书家”“石家庄市全民阅读活动最佳读书人——最佳图书收藏奖”“河北省书香家庭”“石家庄市阅读达人”“石家庄市阅读推广人”“全国书香之家”。退休后,我在一家书城做阅读推广工作,不仅读书、买书更方便了,还通过搞广播、办专栏、办博客和微信公众号、组织活动等方式,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分享读书的快乐。

现在,我每天上班坐拥书城,下班回家满室书香,我的读书人生快乐而幸福。 李兴发/文

## 记忆深处

## 房梁被砸断

抗战时期,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扫荡。村民在八路军的引领下,坚壁清野,奔跑避难。鬼子进村,不见人影,粮无一粒,禽无一只,就放火烧房子,还发射炮弹,我家堂屋房顶的大梁就被鬼子的炮弹砸断了。

那是1944年深秋的一天,母亲和伯母、婶婶在八路军的组织下“跑敌情”回来,进屋点火做饭。这时,距我家一里多地的鬼子发现有炊烟,就对这片地区进行袭击,村子里顿时浓烟滚滚。母亲抱着不满一岁的我,躲到了西屋里。这时,一发炮弹落在我家堂屋的房顶上,砸断了房梁,还砸碎了装满水的水缸。幸亏是一发“哑弹”,我和母亲才幸免于难。母亲吓得浑身发抖,紧紧地抱着我,瘫倒在积水的地面上,站不起来。一名八路军女战士闻讯赶来,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,又扶起母亲,安慰道:“没伤着就好。”接着,她愤愤地说:“别看小鬼子乱逞凶,他们是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几天了!”

我现在已步入古稀之年,对日寇的罪行铭记在心,永世难忘。 孙连杰/文

(编辑提醒:本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## 给老英雄扛面粉

1992年,我大哥买了台电磨,在村里加工面粉,赚点加工费。

那年暑假,我和父母一同回老家。一天,我村的伤残退伍军人孙书凯来大哥家取面粉。孙书凯是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负的伤,一条半腿都丢在了朝鲜,日常走路靠接了假肢的半条腿和双拐,极不方便。

他来到磨坊,让大哥把他家那一小袋面粉放到他的肩上,准备自己扛回家。这时,正好我父亲回来看到了,赶紧过去把面粉放到自己肩上,他陪着这位抗美援朝老英雄聊着天,把面粉给他送回了家。

父亲送面粉回来后,气冲冲地关了电磨,对大哥发火说:

“人家年轻时保家卫国,抛家舍业,腿都丢到了国外,差点丢掉性命,要不是这些人奉献青春和热血,咱们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吗?现在他来磨面,你不说磨完赶紧给送去,还让人家自己扛,你怎么好意思!”

看父亲发那么大的火,大哥不敢辩解,赶紧说:“知道了,知

道了,以后书凯爷来磨面不收钱,磨完赶紧给送回去。荣华大伯来了也一样,他也是在朝鲜受的伤。”荣华大伯是在朝鲜战场伤了右胳膊,右胳膊不能打弯儿。听大哥这么说,父亲才消了气,说:“就应该这样。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他们为国为民的功劳!” 高鹏/文



## 图说往事

## 老师们的合影



1961年,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。国家为了减少开支,大力压缩中小学,我任教的农中停办后,我

被调入本镇的纪王桥完小工作。

当时,老师们的粮食供应每月有20来斤,其中地瓜干占很大的比例。每顿最好的饭食就是一个不足3两、黑黢黢的地瓜面窝头,再就用瓜菜代来补充。在这种情况下,老师们没有人叫苦叫累,工作起来都是兢兢业业,干劲十足。除了星期日之外,我们一律吃住在校,以校为家。

图为那年老师们的合影。前排中为校长胡金洲,右一为本文作者。 郑天峰/文并供图

## 吃花生的故事

1972年,我的小子快3岁了。一天,妻子坐在屋门口做针线活,儿子在屋里玩耍。忽听“啪”的一声,紧接着孩子就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妻子一看,原来孩子爬到方桌下,看到墙根支着一个老鼠夹子,夹子上有颗花生做诱饵,就毫不顾忌地伸手去拿,没想到一下子就夹住了他的手。妻子心疼地自责:“我怎么就忘记老鼠夹子了呢?”孩子的小手顿时肿了起来,却仍固执地哭着要吃那颗花生。

幸亏骨头没有受伤。妻子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手,用嘴不断地哈着热气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,吃花生可真是一种奢求。生产队虽然每年也种两三亩,但除了上缴公粮和留下种子外,社员很难分到花生。那时,要想吃

到花生,只能等队里刨完花生,队长按社员家庭人口的多少划成片,才能在自家的那块地里拾花生。我们一家人仔细地翻找了半天,才拾了小半篮。这可是一家人的宝贝啊!

花生还没有晒干,小儿子就哭着要吃。妻子只好在院子里支起铁锅炒花生。三个儿子围在锅边,弯着腰,眼巴巴地看着,在烟熏火燎中谁也不肯离开。等不到炒熟,妻子就把锅里的花生倒在地上,开始分花生,一家五口人分为5堆,最大的一堆是小儿子的,最小的两堆是我和妻子的。

我和妻子的那两堆花生,可舍不得吃第二个。等孩子们把自己的那份吃光了,我再把自己的那份分给他们吃。妻子的那份则留给了小儿子,让他吃了好长时间。 田兰文/文